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蘇聯的農產品採購・
蘇聯的糧食問題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蘇聯的農產品採購

沃爾琴科、伊凡諾夫著

蘇聯的糧食問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號：1549

聯的農產品採購・蘇聯的糧食問題

者：沃爾琴科、伊凡諾夫
者：甘雨農、趙克成、鐵大章
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行者：新 華 書 店
刷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6,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1-45,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00元

蘇聯的農產品採購 (Заготовки)

著者：沃爾琴科、伊凡諾夫 (Я. С. Волченко, И. И. Иванов)

蘇聯的糧食問題 (Зернов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СССР)

原書著者未署名

譯自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第二版第十六、十七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蘇聯的農產品採購

蘇聯的農產品採購，是城市和鄉村、工業與農業進行經濟結合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保證把絕大部分商品農產品，在法律規定的一定條件下，有計劃地集中到國家手中。城市和鄉村、國營工業和集體農莊生產之所以必須通過商品——貨幣關係利用採購方式進行經濟結合，是由於蘇聯存在着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即國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與集體農莊所有制。斯大林指示說：「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為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系，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系，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頁）採購政策，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政策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農產品的採購，在保證最大限度地

滿足全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蘇維埃國家通過採購方式而取得各種商品農產品和原料。保證蘇聯國民經濟有計劃地和按比例地發展，向城市居民和蘇聯軍隊供應糧食，向工業供應農產原料，國家籌備後備糧食和原料；從組織上、經濟上來鞏固集體農莊，進一步加強蘇維埃祖國的威力，所有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指靠採購工作的順利執行。列寧和斯大林都認為採購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採購工作的直接領導由蘇聯採購事宜部負責。採購事宜部在所有各共和國、邊區、省、區都派有特派員，並設有許多向國營農場、集體農莊、集體農民和個體經濟接收農產品和原料的採購機關。除採購事宜部的各機關以外，個別工業部專設的一些機關和合作社機關也採購農產品和原料。

國營農場各項農產品是通過上繳辦法進入國家掌握的。集體農莊、集體農民和個體經濟的農產品是通過下列幾種辦法進入國家掌握的：（甲）義務供作，它具有稅收性的力量，義務供作的農產品如下：穀物、米、含油作物的種子、馬鈴薯、蔬菜、乾草、肉類、牛乳類、羊乳、乾酪、蛋類、毛類、生皮類、草籽等；（乙）集體農莊利用農產品對農業機器站的田間工作給與實物報酬。此項實物報酬係根據農業機器站在該集體農莊進行田

間工作所得收穫量計算；（丙）糧食加工費（實物）；（丁）集體農莊歸還國家發放的實物貸款；（戊）定購合同制。

按照採購方式交給國家的農產品，均照國家所訂固定的採購價格付款。零星採購和收購的農產品，均按最高收購價格結付價款。由於出售農產品而得到的貨幣資金，是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個體出賣者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國家的採購計劃就是法律。斯大林教導說：完成對國家的義務，即完成採購計劃，乃是社會主義農業工作人員的第一個鐵則。爲完成規定的採購計劃而鬥爭，是一切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機關的最重大的經濟政治任務，它們必須大力幫助國家採購機關的工作人員。

從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頭些日子起，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便認爲保證有計劃地以糧食供應居民，以原料供應工業這一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確立城鄉間、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間正確的相互關係的必要條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國家採購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工作的組織，就是服從這一任務的。

在蘇聯國民經濟高漲、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結合已從一個

形式過渡到另一形式的同時，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也改變了採購工作的方法。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爲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而實施的採購政策，無論過去和現在始終獲得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支持。這是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階段中爲五穀和農業原料而鬥爭所得到的各種成就的決定因素。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列寧和斯大林就立即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以消滅資產階級和地主統治給國家所造成的那種飢餓狀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成立了糧務人民委員部。同日，列寧簽署了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擴大城市自治機關在糧務方面的權力」一項法令。這項法令授權城市自治機關徵收資產階級囤積和藏匿的糧食。

爲了徹底摧毀舊的糧食機構並建立新的糧食機構，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一九一八年一月召開了第一次全俄糧務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在整頓糧務和跟當時在某些糧食機關中胡作非爲的舊官僚的怠工進行鬥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據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法令，把全國一切大糧庫收歸國有。爲了加強國家採購五穀和其他糧食的工作，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組織商品交換以加強糧食採購」的法令，並將大量工業品（紡織品、服飾品、皮革、皮鞋等）撥交糧務人民委員

部掌握。但由於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爆發，蘇維埃共和國隨即與各主要燃料區、原料區和產糧區暫時隔絕，這項業務因而沒有完全實現。在這一期間，糧食鬥爭成爲捍衛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成爲捍衛社會主義的鬥爭。當時的商品糧主要掌握在富農手中，他們怠工，破壞糧食壟斷和固定糧價。爲了摧毀富農的反抗，頒佈了幾項法令，規定實行糧務獨裁。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全俄工農兵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關於賦予糧務人民委員非常權柄以與隱藏糧食並從事糧食投機的鄉村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法令。這一法令責成每一握有糧食的人在一星期內申報所有餘糧。凡不把餘糧繳送糧食收集站的人，均予宣佈爲人民公敵並交革命法庭懲辦。

在一九一八年爲響應列寧和斯大林號召，與糧食投機分子、富農、破壞分子、受賄分子等進行鬥爭而組織起來的工人志願徵糧隊，對於增加糧食採購額具有極大作用。同時，共產黨對根據全俄工農兵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法令而成立的鄉村貧農委員會特別重視。貧農委員會在和富農鬥爭，在沒收富農餘糧、在供應工人中心區域和紅軍糧食上起了巨大的作用。「無產者下鄉工作和貧農委員會的成立，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勢力，並在把中農吸引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這點上發生了極大的

政治作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二七四頁）

斯大林在領導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糧食政策方面做了異常巨大的工作。一九一八年夏，斯大林由黨中央派為擁有非常權柄的南俄糧務總指導員，駐在糧食鬥爭的最重要的地方——當時沒有被白衛軍佔領的東南糧區中心沙麗城。斯大林同志出色地解決了列寧向他提出的艱鉅任務。一九一八年夏蘇維埃共和國各工業中心區域所得到的全部糧食，差不多都是從沙麗城發送出來的。

一九一八年末和一九一九年初，鄉村中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因而有利於蘇維埃政權。富農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受到了猛烈破壞。中農成為糧食（其中包括商品糧和其他農產物）的主要生產者了。革命進一步的成功的關鍵在於哪一個階級——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能把中農吸引到自己一邊來。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列寧簽署了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在生產應該讓國家掌握的各種穀物和飼料的省分實行餘糧收集制」的法令。這項關於餘糧收集制的法令確定了一項原則，即農民除供養家口和飼養牲畜及維持播種以外的每一普特糧食，都應按照固定價格交給國家。法令還為農民訂出

了供傳農產品數量的具體任務，餘糧收集制是農民供給國家的一種特殊貸款，也是不得已的、臨時性的措施。正如列寧和斯大林屢次指出的，由於國內戰爭條件而引起的餘糧收集制，其基礎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所藉以支持的基礎，是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農壓迫的保障，工人按照餘糧收集制從農民方面取得糧食。」（同上書，第三〇六頁）餘糧收集制在當時並不是國家採購農產品的唯一方法和形式。除餘糧收集制以外，國家還從國營農場，從以實物交納的穀稅，從城郊的蔬菜乳酪場等得到糧食及其他農產品。

由於外國武裝干涉者的失敗和國內戰爭的勝利結束，於是便有可能轉而着手和平經濟建設。一九二一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以及因此須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極重要的決議。不單是就全國範圍，並且也就個別農戶精確地規定了糧食稅的數量。糧食稅是滿足國家的糧食和原料需要的一種臨時方式，它是累進的，有階級性的稅收。糧食稅的總額比一九二〇——二一年餘糧收集制得到的糧食總額要少一半。糧食稅建立以後，農民交給國家的只是一部分餘糧，其餘部分仍由農民自己掌握。因此，就造成了農民擴大農產品生產的刺激。

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改變了圍繞着糧食採購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方
法。富農階級看到蘇維埃政權關於糧食稅的法令已得到普遍的和全民的支持，就轉而採
取別的鬥爭方策。富農極力隱瞞耕地數量，虛報人口數目，以便少向國家繳納糧稅，並
拖延交納糧稅期限。但是就連富農的這種指望也被粉碎了。

糧食稅建立以後，農民負擔大大減輕，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聯盟鞏固起來了，因而在
經濟上和政治上完全證明了建立糧食稅的正確性。商品流轉的活躍和擴展，使農民在完
成國家的糧食稅任務以後，還有極大可能來自由地支配自己勞動的產品，並能與市場相
適應，在國家播種計劃所規定的作物以外，另外選種最能獲利的作物。

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獲得成功，因而蘇維埃國家可能改用貨幣稅收來代替糧食稅，
並轉而通過市場自由買賣方式來採購農產品。因此，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就撤銷了糧務
人民委員會。組成了商業人民委員會，以便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的決
議，對商品流轉進行有計劃的領導。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批准了設立商業人民委員會的
提案，「並在一切商業機關面前提出了掌握市場並把私人資本從商業範圍裏排擠出去的
任務」（同上書，第三三一頁）。價格問題是當時的中心問題，圍繞價格問題進行了殘酷

的階級鬥爭。斯大林同志指示說：「現在我不來談地主和餘糧收集制問題，而來談糧價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廣闊而十分複雜的，要求認真研究和嚴重戰鬥的戰場。……現在主要問題是市場和城市商品與農產品的價格。」（斯大林：「論黨在農村中的任務」，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一五頁）蘇維埃國家力求通過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格來刺激農業生產，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國家利用對農產品的購銷工作進行經濟調節的辦法（減低商品價格和改進商品質量，靈活運用各類商品，運用優惠信貸等）作到了這一點。採取股份公司形式的國營經濟核算組織如：「糧食公司」、「糧食出口公司」、「俄羅斯油脂新迪加」、「獸毛公司」、「棉花公司」以及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等都進行農產品的買賣。由於蘇維埃國家實行這種政策，於是便把私商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從而大大增加了國家和合作社的計劃採購數量。如果說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四月一日的糧食採購總額是四億三千四百萬普特的話，那末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四月一日，就增到五億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採購量雖然大大增加，但由於穀物經濟方面發生恐慌，一九二八年國家在糧食戰綫上仍然遭遇到各種困難。發生這類困難的基本原因，是由於農民小商品經濟的存在和富農的反抗，因此，商品糧生產量的增加比糧食需要量

的增加慢。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糧食採購額比一九二七年一月少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這種短少也就成爲「糧食採購危機的典型數字表現」（斯大林：「糧食採購運動的初步總結以及黨今後的任務」，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〇頁）。斯大林同志在消滅這一危機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斯大林接見農業合作社聯盟、「糧食聯合」、「糧食公司」和商業人民委員部的代表發表談話，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由於西伯利亞糧食採購工作的進展不能令人滿意，斯大林同志根據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委託前往該地。從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六日，斯大林在出巡期間訪問了西伯利亞的主要產糧地區，出席了聯共（布）西伯利亞邊區委員會政治局、聯共（布）各民族州委員會政治局的會議，並和各地蘇維埃與採購機關一起參加了巴爾納烏爾斯克、比伊斯克、魯布佐夫斯克及鄂木斯克各民族州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由於斯大林採取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措施，西伯利亞黨組織從一九二八年一月末起，就急劇地增大了繳糧速度，並保證了糧食採購計劃的完成。爲了消滅引起一九二八年糧食採購危機的各項直接原因，「首先應對抬高糧價和用飢荒來威脅國家的富農和投機分子進行打擊」（斯大林：「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七月全體會議工作的總結」，載「斯大林全集」，俄文

版，第十一卷，第二〇五頁）。黨和政府針對富農採取了許多非常措施，對他們援引了刑法第一〇七條，凡犯投機罪行的人均應交法庭審判，其商品則予沒收充公。「非常措施使國家擺脫了一般的經濟恐慌」（斯大林：「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七二頁）。同時採取各種措施去健全地方採購機關和黨組織，消滅工作中的自流心理等。等到在集體化基礎上解決穀物問題和建設農業機器站與國營農場的辦法擬定以後，爲了迅速消滅肉、乳產品供給上所發生的困難，於是就根據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三〇年）的決定，成立了「畜產」聯合公司，「養豬」聯合公司，「養羊」聯合公司，「脂乳托拉斯」，它們各設有許多國營農場。國營農場交給國家越來越多的、品質優良的、便宜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肉類、油脂、乳類、毛類和技術作物。同時，國營農場通過真實範例的力量和大規模合理經營農業的經驗，促進了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改造農業，並進一步向富農階級進攻，在城市與鄉村的結合方面，除掉舊的方式而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式。這些新的方式是在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生產聯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方式中，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間曾經起過重要作

用的，就是當時普遍實行的糧食、技術作物和畜產品的定購合同制。根據這種辦法，需要事先簽訂剩餘商品農產品的銷售合同（糧食和技術作物要在播種開始前簽訂）。實行定購合同制曾經是從小批買賣農產商品向大批定購農產商品過渡的辦法。這樣，就不但加強了國家調節農產品和原料的價格的作用，而且也加強了國家對農業生產的方向和範圍的計劃作用。定購合同制，在從市場中把私商中介人迅速排擠出去並從商品流轉中把資本家排擠出去這一點上，曾經起了相當的推進作用。所有這些，無論在使農戶結合在集體農莊裏，或者在加強農產品的採購工作方面，都起過良好的影響。斯大林在說明定購合同制時，曾這樣着重指出：「這種制度之所以良好，就是因為它對雙方都有利，並使農戶和工業不需中介人而直接地結合起來。這種制度是農戶走向集體化的最可靠的道路。」（斯大林：「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二二五頁）最重要的農產品和畜產品的定購合同制，是採購的主要方法，它一直存在到戰前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結束為止。以後，定購合同制曾被用來而目前也在用來採購棉花、糖蘿蔔、其他技術作物、蔬菜和水菓。其所以如此，就是由於這些產品的生產特點所致。最重要農產品的定購合同制，在準備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

時期中，曾經起過積極的推進作用。但當蘇聯在集體農莊制度方面業已取得勝利而農業機器站組織和蘇維埃商業已有廣泛發展的時候，這種制度就不再符合於國家的利益和農業的發展速度了。

黨和政府曾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九月二十三日的決定改變了以前採購肉類、牛乳、奶油和乾酪的定購合同制，又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所作的決定廢止了採購糧食的定購合同制。給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戶規定了一種具有稅收力量的義務供售辦法與向國家繳售糧食、馬鈴薯、向日葵、稻子、毛類、肉類和牛乳的固定定額。集體農莊義務供售農產品（糧食、馬鈴薯、向日葵）的數量，是按所定定額並依這些作物的播種計劃來計算的。畜產品的義務供售額，是這樣規定的：肉類——按照產畜的頭數；牛乳——按照乳牛的頭數；毛類——按照綿羊、山羊和駱駝的頭數。供售的定額，都是根據牲畜的頭數來規定的。而產品的價款，則是按照國家的計劃採購價格來計算的。新的採購制度，無比地鞏固了集體農莊的地位，並保證了它們能够確實地計算自己的收入。除了向國家義務供售農產品以外，對採購有過巨大作用的，就是對於農業機器站的工作所給予的實物報酬。實物報酬，就是說集體農莊必